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零六期 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编者的话：阮铭先生此文，讲述的是他1977年夏天去中央党校到1979年4月理论务虚会结束这段改革初期历史的亲历。此前是文革，此后有“风波”。如果视野再延伸，可以看到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国民党、共产党先后建立政权的轨迹，期间显示了中国摆脱专制追求现代化的种种曲折艰辛乃至周而复始。

观乎这段历史，难免使人顿生历史决定论和循环论的错觉：人们自以为是依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其实不过是在排演历史的脚本。而中国近现代的脚本，则早在百年以前就已写好。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康梁二先生在与孙中山先生们的论战中，就将这个脚本概括为“以革命始，以专制终”。日后事态的发展竟证实了他们的预言。五四以后，这个脚本又有了新的变化，按照朱厚泽先生的总结，叫做“以民主始，以专政终”。五四时期对民主的呼唤在1949年以“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式得以实现。

而所谓改革，又一次上演了这一脚本。文革浩劫之后，重归五四，再续前缘，以完成五四未竟之任务，结果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重蹈覆辙，仍旧是以民主始，以专政终，就像遇到了鬼打墙。如果说上一回的顶点是文化大革命，这回则是武力清场。

盘点那一改革时期的主题，仍旧是科学与民主，仍旧是反封建。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即使浩劫年代也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继续被当作批判的武器。那个造成浩劫的直接责任人及其思想，也被当作民主的权威加以引证。这种情形，有多少是出于历史的局限，有多少是出于无奈与策略性的表述已经无法分清，但是它反映出一种根本的无法克服的困境，那就是，与五四时期大为不同的是，这次是在专政的条件下搞民主，这并不比在专政的条件下搞革命更合逻辑。这种情形意味着，民主的合法性是由专政赐予的，民主的观念则是由专政的意识形态和它的权威人物提供的。

当胡乔木“修饰”邓小平的讲话稿时写道：“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两者是一件事）制度化、法律化”的时候，他道出了事情的真谛。正如建政之初毛泽东对人民民主的定义：人民民主即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民主即专政，不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逻辑，也是历史的具体过程。这一表述和过程构成了一种道统。当权力已经稳固，而改革派的进一步探索触动了这一道统时，自然要予以打压，直到升级为武力清场。至此，有关无产阶级民主，有关人民民主的神话破灭了，剩下的只有专政二字，这才是道统中最坚硬的内核。

亲历改革初期理论风云

阮铭

富强胡同

一九七七年初夏的一天，前北京团市委的一位书记周世贤，忽然到我家，告诉我胡耀邦请我星期天到他家里去。我有点意外，算起来，我与胡耀邦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叫我去做什么呢？我于是问地址，周世贤说还是二十五年前他来北京时住的富强胡同那个院子。

当我走到灯市西口富强胡同六号那个熟悉的院子时，似乎唯一的变化是门口那两棵槐树长得又高又粗了。推门进去，第一进住的人我已不认识，转到里面小院，就是胡耀邦的家。胡耀邦看见我，站了起来，还像过去那样，随便地打招呼、握手，并不显出久别重逢的隔膜或者兴奋，倒好像我们并没有分别多久似的。我仔细端详他，也看不出他有多大变化，还是那么瘦小精干，充满活力的老样子。只是右眉有点异样，仿佛有一半淡了下去，与黑黑的左眉不相称。后来他告诉我，那里长过一点皮肤癌，切掉了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是十几年前我所见的，做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耀邦同志”，连说话的声调、手势，说到兴奋处不时从旧沙发上站起来的态度，都与过去无异。

我坐下来，他直截了当提出要我到中央党校帮他办一个理论刊物，他已取名为“理论动态”。似乎为了说服我，他讲了几条理由：

一是中国到了转变时期，要研究新情况，发展新的理论观点；我们面临打开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没有新的思想理论准备，对付不了。

二是他办的理论刊物，不要大块文章，一期一个题目，三、五天出一期，三、四千字，四到六页。他说：“鲁迅把他的文章叫作匕首和投枪，我们要学鲁迅的风格，写成理论的匕首和投枪；要活泼生动，不用八股调，所以叫理论动态。”

三是讲到。他说：“我是做了一番调查研究的，对你的文章我有印象，不落俗套。我叫小梁（他的秘书梁金泉）找你，没打听到。那天秦川来看我，谈起你就住在沙滩他家楼下，总算被我调查出来了。”

我也直截了当回答他：“我不去。”他有点不解地望着我，我未等他发问，讲了自己的理由：

第一、我不想搞政治理论，准备转到科技方面去，本来我是学科技的；现在童大林改行去国家科委，要我去他那里的政策研究室，我已经答应。

第二、我知道一点中央党校的情形，那是康生、曹轶欧、李鑫他们的领地，整人比“四人帮”还恶毒，“四人帮”倒了，康生帮派权势显赫，我不能去。

第三、中宣部军事管制小组定我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罪尚未平反，先说我反陈伯达，陈伯达倒了，又说我反军管、反康生，指证我“罪名”的“批陶联络站”干将，还在中央党校当权。

胡耀邦简单地驳了我的第二、三条理由，说他自己的“罪名”也没有做结论，康生问题他与我看法一致，迟早要解决的。第一条他没有驳，他说他不勉强我改变选择，“但这样吧，现在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你先干一段，三个月，我再从山东找个人来，那时你去科委，我跟童大林讲一下。”

我似乎不好再拒绝。这样，第二天我就去了中央党校，三个月后也未能脱身。胡耀邦说的从山东找的人始终未来，我却越来越深深地卷入了理论斗争的漩涡之中，前后达五年之久，直到一九八二年胡耀邦辞去中央党校副校长、陈云派王震接管，宣布要把中央党校办成他们

的“黄埔军校”。而王震到党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除我出党。

我到中央党校向胡耀邦报到那天，他似乎很忙，匆匆同我谈了几句，主要是说若瑛和我一起来党校，他已安排若瑛在“三部”（即培养理论工作研究生的学员部）工作。接着要我同他一起去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辅导问题的座谈会。下午又开了一个小会，给《理论动态》出题。“如何把学习《毛选》五卷的辅导搞得更好一些？”就是题目之一。胡耀邦说：“第三期就要列出这一题，要写把主要精力放在读原著，不要读什么辅导材料。”他说，那些辅导材料连基本事实都搞错。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主要是批评斯大林时期的错误，批“左”，批教条主义，辅导材料却说是反对赫鲁晓夫，反右，反修。

当时《理论动态》第一期已出，第二期已定稿，第二天就要出。我看胡耀邦很着急，散会后就根据自己的记录，把他的意见整理成文，加上一点自己的发挥，如“防止曲解原著、专断蛮横、以势压人的学风和文风”等，主要是针对汪东兴、李鑫的那个理论班子。写完后交给了当时《理论动态》的召集人孟凡，我就匆忙赶党校的下班车回沙滩了。过了一星期，第二期、第三期都已出来，却未见“学习《毛选》”那一题。后来梁金泉告诉我，我给孟凡交稿时，他在旁正好看到了，但孟凡把稿子藏起来不交，却让沈宝祥另写，沈宝祥的稿子修改了两次胡耀邦都通不过，那时梁金泉要孟凡把我的稿子拿出来给耀邦看看，孟凡才被迫拿出来，耀邦看后，未改一字就让复印，那已是第四期。小梁说，胡耀邦问孟凡为什么隐匿我的稿子，孟凡答他怕“打击年轻人（沈宝祥）的积极性”。然而，沈宝祥的年纪似乎和我差不多。

那时将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耀邦嘱我编一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的论述，准备在十一大前那期《理论动态》（一九七七年八月十日）刊出。我选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比如毛泽东的“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这虽是毛针对林彪的，但对当时制造新（华国锋）、旧（毛泽东）个人崇拜，也有很强的针对性。胡耀邦看了，很欣赏这组语录，然而内部多数人反对发表，怕得罪了制造和欣赏新旧个人崇拜的人，尤其在十一大的时候。这一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给压了下来，四个月後，毛泽东诞辰前夕（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在《理论动态》第三十三期刊出。

胡耀邦平日住在党校，只有星期三、六回富强胡同。他白天工作繁忙，常在晚上找《理论动态》的人，但从来没有人通知我。有一天，梁金泉遇到我，说耀邦常问：“阮铭怎么不来？”孟凡总说：“他一下班就回家！”小梁问我能不能住在党校？

我说怎么不能？但孟凡说党校没有房子让我住，我和若瑛只得每天来回奔波。孟凡见我，言必称“康老”，似乎在暗示我这样的“反革命”，怎能来此“圣地”？

小梁若有所思，第二天来说，他在医护室找到一间空房，让我暂时住一住，因耀邦晚上想找我。此后，我就住在那间小房，晚上小梁常来，让我坐在他的脚踏车后座，载我到耀邦住所。耀邦和我的许多谈话，就在那些晚上，他把那种自由交谈称作“酝酿思想”。

有一次，谈到产生“四人帮”的社会根源。那时的中央文件，说“四人帮”是“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耀邦不同意这个判断。他说：“我们在思想政治领域，究竟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胡耀邦说，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什么宫廷政变、吕后、武则天、法家那一套，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王洪文是流氓无产阶级。

我说，在中宣部，我查过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讲话，明确讲中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严厉批评党内企图直接从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所以应该说毛泽东是党内最早的走资派。

胡耀邦说他也有这个印象，毛泽东在七大对资产阶级做了充分肯定，讲资本主义对发展生产力还有进步作用。

我说，毛泽东在七大讲有三种资本主义：一种法西斯的资本主义，是反动的；一种民主资本主义，像美国，今天还有进步作用；还有一种，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毛泽东把他的新民主主义视为三种资本主义之一。

那天，他要我写一篇长文章，一、两万字，从思想解放运动的角度讲清这个问题。我写了那篇《“四人帮”的覆灭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看了很满意，让他的秘书印成清样，送给一些人征求意见，准备在《理论动态》发表。

当时，只有罗瑞卿打电话给胡耀邦表示赞赏这篇文章，说“发表后军队要读，人手一份”。其他人或置之不理，或坚决反对。胡耀邦只得暂时搁置。

耀邦同我也谈到朝鲜战争。他说毛出兵朝鲜是非常犹豫的，胜负只是考虑因素之一，更深远的是中国的道路问题。毛不赞成斯大林的两大阵营，开始提“中间地带”，后来主张“三个世界”，就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与苏联保持距离。毛意识到出兵朝鲜会改变中国的道路，改变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毛后来常说，朝鲜战争后，斯大林才相信毛不是铁托，但毛自己却是被迫的选择。斯大林死后，朝鲜战争结束，毛想改过来，提出“双百方针”、“十大关系”；但苏联一套已根深蒂固，改不动了；一提“双百方针”，就有百分之九十八的高级干部反对，一提反右派，就立刻响应。

我发现中国共产党内，对待毛泽东，存在明显不同的两种态度：

一种是思想家的态度，像胡耀邦、周扬。他们把毛当作一个历史人物，对他进行历史和环境的分析，历史地分析他的思想变化，并不因为毛泽东整过他们而改变评价的客观标准。

另一种是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们把毛泽东当作攫取自身权力的工具和打击他人的“棍子”，只是根据一时权力斗争的需要，玩弄手里那几根吓人的棍子。胡耀邦鄙视这种人，称他们是“理论棍子”、“理论恶霸”。

有时，我们也谈到华国锋。胡耀邦对华国锋的印象主要是正面的。

一是他们有过一段友好的合作。胡耀邦说，文革前他曾两度带职下放。第一次在湖南，同华国锋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合作愉快。华国锋接触实际，重视生产；毛泽东曾批评华“脑子里就是生产，没有阶级斗争”。第二次在陕西，文革前，陕西在“社教”中整人已十分严重，胡耀邦到西安时，已整死六、七百人。胡耀邦下去落实政策，恢复生产；刘澜涛（就是那个一九五九年把“机关枪、迫击炮”送上庐山整彭德怀的人）把他整了一百多天（胡耀邦工作共九十九天），整得他“颅压升高，蛛网膜下腔出血”，医生诊断“有生命危险”。幸好叶剑英视察西北，到西安硬把胡耀邦拉上飞机，送回北京治病。

二是肯定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绩。华国锋与胡耀邦谈他如何下决心抓“四人帮”。华说，毛去世后，他几天几夜睡不好觉，考虑用什么方法解决“四人帮”？开会不行，中央委员会里拥护他们的不少，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地方政权也有一些在他们手上，像上海、辽宁。弄不好打内战，损失太大。最后决心把他们抓起来，与叶剑英、汪东兴商定，做好周密部署才动手。胡耀邦认为此举说明华处理大事果断，使“四人帮”措手不及。

三是胡耀邦对华国锋的主要意见，华用了一个小圈子的人把自己包围起来，用两个“凡是”制造新旧个人崇拜，阻挠纠正冤假错案。

工作上，胡耀邦对华国锋是很尊重的。他办《理论动态》，希望能得到华的支持，并在思想理论方面给华以积极影响。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底，我写过一篇短文《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胡耀邦看了比较满意，指定在十二月三十日《理论动态》第三十四期登出。这篇短文意外得到了华国锋的肯定。胡耀邦高兴地告诉我，华国锋给他打电话称赞文章写得好，还给正在为华起草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作报告的写作班子读了那篇文章，要他们参照这篇文章起草他的报告。我想华国锋的这些话，恐怕还是真诚的，因为他没有必要在这样的事情上给胡耀邦做出虚伪的姿态；当然，他也没有看出文章的观点，同他那个写作班子（李鑫、熊复、胡绳、吴冷西、郑必坚等）的观点之间的分歧。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转变

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把注意力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发展生产力，改革不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来。他那个写作班子显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观点。

理论漩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下旬的一个周末，胡耀邦打电话叫到我到他家里，告诉我他已去中央组织部上班。那是叶剑英同华国锋商量后，中央做出的决定，任命胡耀邦当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原来，当初抓了“四人帮”后，叶剑英让他的儿子叶选宁带消息给胡耀邦，要他想今后如何治国？胡耀邦想出三句话：

- 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 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 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也就是他后来常说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胡耀邦虽在中央党校组织过一些文章，如《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主张“敢于推倒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陷不实之词。”但由于组织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和组织部的汪东兴、李鑫、郭玉锋这几个人手里，平反冤、假、错案阻力极大，需要派胡耀邦去打开局面。

我对胡耀邦说：“你答应我来党校三个月，现在五个月了，你自己去中组部，也该放我走了吧？”

他说：“你不忙走，我还兼管党校，《理论动态》不能散。”

我说：党校那些人怎么对付我，你比我清楚。我第一天报到，听你讲《毛选》五卷辅导问题，看你很急，我听完花一个小时整理出来，好赶上你说要在第三期登出。结果被孟凡隐匿起来，只因小梁当时在旁看见，孟凡让沈宝祥弄的在你那里又通不过，你讲反“左”，反教条主义，他们照李鑫的讲反右、反修正主义，当然通不过。最后拖了一星期，小梁逼孟凡交出我的稿子，才登了第四期。后来你让我写的那几篇，从批封建专制主义、流氓无产阶级，到防止中共十一大搞新旧个人崇拜，哪一篇不被他们封杀？我早就说党校这块“康生圣地”，我不想进也进不了。现在你还让我留，“言必称康生”帮容得了我吗？

耀邦说，这些他都知道，当初他调我到党校，打算成立理论研究室，有人反对，拖了下来。现在他已想好，还是要成立，先让吴江来兼主任（吴江是哲学教研室主任），我当副主任。他再设法从外面调点人来。

我说“官职”我没有兴趣，重要的是能合作做事。你常说“换思想不换人”，用意是好，可惜人的思想难换；我看得多的是“换人就换思想”，昨天“言必称康生”，今天“言必称耀邦”，那不是真思想，明天不知道又去“称谁”？

但我还是留了下来。接着是理论研究室成立，吴江兼主任。胡耀邦又从南京调来一位老同志陶白，吴江又从人民大学调来一位他的学生孙长江。这样就有了我、陶白、孙长江三个副主任。这两位新来的副主任，思想都自由开放，而且有独立性格，我们很合得来。

陶白是个诗人，秉性豪爽，放言无忌。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朋友在他家，要介绍给我认识。到他家一看，是位精神抖擞的老大姐，名叫戈扬，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女记者之一，杨刚、浦熙修、戈扬、彭子冈四人都曾被打成右派。戈扬复出担任《新观察》主编，她来约陶白写稿，陶白又向她推荐约我写稿。

我说，刚看到报导共产党员范熊熊揭发特权腐败，被官僚逼得自杀，我深感悲愤，写这个你能登吗？

戈扬答的很爽快：“你敢写，我就敢登”。

那时，《新观察》刚出了创刊号，我写好文章寄去，戈扬很快寄来第二期《新观察》，我的文章赫然登在第一篇，引来不少读者来信。林希翎看了，找到我办公室，诉说她的右派不

得改正。我说，袁永熙的右派不得改正，阻力来自蒋南翔，我反映给冯文彬，胡耀邦就解决了；你的不得改正，是要印证“反右必要，错在扩大化”的邓小平之“一言”，胡耀邦也改变不了。你只要有自由就好，现在左派未必比右派光荣。

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写了一篇《科学和民主》，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九周年，主要批判专政派，末尾有一段针对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

大家记得，在一九六六年，怀抱反修防修热情的那些青少年，是迈着不整齐的步伐涌向街头的，他们没有经验，往往选错造反的目标。可是到了一九七六年，人民整齐的步伐走上天安门广场，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怀念周总理的悲歌，矛头一起指向万恶的四人帮。

《人民日报》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转载此文时，这段被迫删去了，因为汪东兴、李鑫的“理论王国”坚持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然而，文字被删反而激起人们竞相传播这段删掉的话，更加满怀兴趣去寻找《理论动态》的原文来读，使汪东兴大为恼火，在一次“宣传口”的会上大骂这篇“特约评论员”。

五月五日，胡耀邦在富强胡同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时说：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精神枷锁要靠自己砸，不能靠人家恩赐。阮铭写的那篇文章，在有些地方引起震动，是有水平的。几十年来的问题，一下抓住了，科学和民主。凡是我们的文章，要站得高，从历史经验来谈问题，从一个时代、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谈问题，不是从具体工作上的几条琐碎的东西谈。

紧接着，是五月十日孙长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发表，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出，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就在五月十二日晚十一点，吴冷西打电话给胡绩伟，严厉指责这篇文章是“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

反对这篇文章的势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汪东兴、吴冷西、张平化等“凡是”派。另一方面，是正在窥测风向的胡乔木和邓力群。

六月二十日晨，胡乔木到胡耀邦家中施加压力。胡乔木说：“真理标准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会造成党的分裂。我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理论动态》不能再发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

胡乔木一走，胡耀邦就把吴江和我找到他家，告诉我们胡乔木的意见。我说：孙长江的文章没有错，无所谓“挑起争论”，是吴冷西、汪东兴发动挑战，罪名上纲到“砍旗”、“非毛化”，不能不回答。

胡耀邦说：“暂时冷一冷吧，《理论动态》不要再发了，先登两期地方党校刊物上的文章。”

那时，孙长江已写好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反驳汪东兴、吴冷西、张平化们的挑战，经吴江改定。胡耀邦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未让《理论动态》发表，把文章送给了罗瑞卿。罗瑞卿亲自修改后，要《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于六月二十四日登出。罗瑞卿说，不是有人讨厌“特约评论员”吗？《解放军报》就用“特约评论员”发表这篇文章。

《理论动态》怎么办？我不甘心按照胡耀邦“暂时冷一冷”的表示去转载地方党校刊物上的文章，自己就以五月五日胡耀邦的那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了一篇短文。此时“七一”将临，我想就作为纪念党的诞辰的文章吧，给胡耀邦送了去。文中没有直接写真理标准讨论，而是从如何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高度，抨击了那些蔑视人民意志、阻挡历史潮流的反改革势力。

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内部讨论时通不过，后来一起到胡耀邦家里，争论才得到解决。文章于六月三十日发表于《理论动态》第七十期，《人民日报》七月一日转载时，用了初次登《理论动态》文章时用的署名“岳平”。这是因为汪东兴刚刚指责了“特约评论员”，这次避而改用“岳平”，这是对汪东兴的让步。

七月二日那个星期天，胡耀邦带他的孩子到西郊游玩，特意先来党校找到我，告诉我这篇短文他读了四遍，还发挥了一通写文章要“提神”的议论。他说：“文字要让人读起来提神，读一段，提一个神，又读一段，又提一个神，每读一段都提一个神，这样的文章，人才喜欢读。”

七月九日，胡耀邦找《理论动态》组开会时，又提起这篇文章。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我看了五遍，华主席看了两遍。”还说：“《理论动态》是理论战线上的一枝花，一群尖兵，一个号角，将来历史会给我们做出总结来的。”

一九七八年七、八、九、十那几个月，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策动的。张平化在中宣部召开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专门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争。张平化说：“毛主席生前对省市负责同志讲，不论是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不要随风转，不要认为登《人民日报》，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省委同志有不同意见，希望向我们反映，对中宣部工作有帮助。”张平化还向到会者拱手说：“拜托，拜托！”

然而，“表态”的结果却与策动“表态”的愿望相反，全国各省市都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者都不表态。熊复的《红旗》杂志就不表态，他只是到处散布：“要顶住这股风，随时准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有各省市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理论实践问题讨论会”。当时担任社会科学院顾问的周扬，在讲话中指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我看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周扬的讲话获得与会者热烈赞同，并且立即传播到会外，对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胡乔木知道后十分气恼，在会议闭幕时突然宣布：“我负责地向大家申明，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绝对不存在思想路线分歧，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人们无不感到诧异，仅在一个月前，胡乔木到胡耀邦责难“党校挑起争论”、“争论下去会造成党的分裂”；怎么忽然又变成“中央完全一致，绝对不存在分歧”了？

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即一九七八年秋季，胡耀邦还要我起草妇女和工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提出新时期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历史使命。

两个报告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就是在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彻底结束妇女和工人阶级的奴隶地位，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在妇女大会报告中，提出妇联组织必须同一切侵犯妇女基本权利和利益的社会现象坚决斗争，使她们成为支配自身命运的自由自主的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家庭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

在工会大会报告中，提出工会组织必须成为保卫工人利益的堡垒，在我国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独立性主动性，吸引全国工人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参加管理自己的国家，管理自己的企业，管理自己的一切事业。

胡耀邦曾称赞妇女大会的稿子“气势磅礴”，还说华国锋称赞工会大会的稿子，问“是谁写的”？然而，经过重重审查“阉割”，等到康克清、倪志福做正式报告时，“棱角”磨光，“气势”毫无，更别说付诸实行了。

只是后来全国妇联书记处鉴于各地发生残害妇女的悲剧，准备在《中国妇女》杂志展开“保卫妇女基本权利”的讨论，约我写稿，我写了一篇《妇女是人》。据约稿的侯荻女士告诉我，妇联书记处审阅时，称之为“中国妇女的反封建檄文”。可惜这场保卫妇女基本权利的讨论，尚未展开就被邓力群一手压制。他迫不及待发“指示”，称妇联只要管管母亲教育孩子的事就够了。接着，“紧跟”邓力群的评论家、作家，发表了一批主张妇女回到厨房、保证丈夫无后顾之忧的时髦作品，中国妇女仍然走不出被支配的奴隶地位。

历史转折

被称作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起了关键作用。他不但为这个转折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而且为实现这个转折，运用了社会民主运动与党内改革力量的暂时联盟。没有胡耀邦创造的这两个条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凡是”派，是不可能如此轻易退却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主要的争论是在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的。这个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会议开始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凡是”派手里。汪东兴是会议秘书长，并直接掌握会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的主要文件和讲话，包括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公报，已由汪东兴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准备好。这个中央理论小组，也就是会议文件和讲话起草小组，成员有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郑必坚、龚育之等人。他们原来的意图是这样的：

一是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华国锋“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的纲”。

二是提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两个目标是冲突的。当时粉碎“四人帮”已两年多。这两年多中，汪东兴的理论班子为华国锋起草过大量讲话和理论文章，中心思想就是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们成功地把这个理论同华国锋挂在一起，其公式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华国锋所以能够继承领袖的地位，是他坚持和捍卫了这一理论。

但华国锋不同于汪东兴与他手下的理论班子，华有实际工作经验，懂得粉碎“四人帮”之后，把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不可违背的人民意志。所以他很想把历史已经证明冲突不可避免的这两个目标，“统一”起来。

胡耀邦为了会议能打破“凡是”派设定的框框，想了几条：

一是增加党内改革力量参加会议。胡耀邦向华国锋建议，多吸收些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参加，像周扬、胡绩伟、秦川、杨西光等人，他们在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运用社会上民主运动的力量。那时西单民主墙已很活跃，有提出平反冤假错案的，有讨论民主政治的，有揭发各地党政部门官僚主义与不法行为的。胡耀邦要我们收集一些主要问题，让冯文彬到会去“启发思想”。

三是帮助重新起草会议的讲话和公报。

会议进行中的十一月十五日，胡耀邦找了冯文彬、吴江和我到他家中，提出要为叶剑英和邓小平各起草一篇讲话稿，内容有所分工：邓小平讲重点转移，叶剑英讲分清是非。胡耀邦说：“这几天小组会讨论重点转移讨论不下去，许多大是大非不清楚。一大堆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大量冤假错案，牵涉一亿人。还有康生问题没有揭开，不解决怎么同心同德搞四化？”

胡耀邦说，邓小平讲话已由胡乔木起草；叶剑英的讲话，要我和吴江起草，限三天拿出初稿。十七日我写出初稿交给吴江，同时印了一份清样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林涧青，请他帮助修改。吴江未做多少改动，林涧青改得较多，我汇总后于十八日如期交给胡耀邦。

那天，冯文彬从中央工作会议回来对我说，耀邦对稿子很满意，说“超乎预料”；传给会上老朋友看，吕正操看了兴奋得从沙发上跳起来。冯文彬同我一起到叶剑英住处，把稿子念给他听。叶剑英坐在一张很高的椅子上认真听，听完高兴地站起来同我握手。

十二月一日早晨，胡耀邦打电话叫我立刻到京西宾馆见他。见面时，胡耀邦说，叶帅那个讲话邓小平看过，都同意；但邓对胡乔木给他起草的稿子不满意，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了，你给我找人重写”。胡耀邦把邓小平交给他的胡乔木的稿子给了我，讲了一点他的设想，又限我三天写出初稿交给他。

我说，我不了解邓小平的思路，没有把握；我得去请教林润青，他在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研究室，对邓小平的思路比我了解。胡耀邦同意后，我立刻去找林润青，一起先研究了胡乔木的稿子，觉得确实不行。我们商量了一个提纲，说好我先写出来后再找他修改。

第二天我刚写了一个开头，林润青来电话，说邓小平有新想法，要找起草人，要我赶紧去。后来我们就按照邓小平十二月二日讲的想法，起草了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参加的还有滕文生和苏沛。

滕文生起草第一部分“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用了曾经被胡乔木反对、胡绳在会上攻击的周扬论真理标准讨论那段有名的话，现在由邓小平的嘴说出来，就封住了胡乔木和胡绳的嘴。

我起草的是第二部分讲民主和第三部分讲分清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这部分后来发表时，被胡乔木篡改最多，加上了“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强调“统一集中”的话。

第四部分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是苏沛起草的。

最后由林润青统稿。

这里需要提一下为什么邓小平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了”。事实上，邓小平看到胡乔木仍在他和华国锋之间投机，同之前对待真理标准的态度一样。胡乔木起草的稿子中，也用了邓小平的一些话，如邓讲“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但胡乔木改成了“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两者是一件事）制度化、法律化”，而且还加上一句“这个问题华主席和其他同志都已说过多次”。胡乔木也写了“改革”，但说“改革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王、张、江、姚是走资派，河南省委的王维群、驻马店地委的苏华，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头脑，随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

邓小平虽然看出胡乔木的“思路不行”，但他了解也需要胡乔木。毛泽东批邓时，胡乔木已背叛过邓一次。胡乔木托王震、邓力群说情，自己痛哭流涕检讨，邓继续用他，说他不是“卖身投靠”，只是“软骨头”。这回看出他的“思路不行”，是由于他在邓与华国锋之间摇摆不定。所以稿子不能用，胡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邓小平仍把我们起草的讲话稿，和后来我们起草的三中全会公报稿，交给胡乔木做“文字修饰”，实际上，胡乔木的“修饰”绝不止于“文字”。

我在接触中深深感到，胡耀邦和胡乔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胡耀邦在思想原则问题上从不模棱两可，毫无胡乔木那种患得患失的投机心态。胡耀邦对邓小平和华国锋，都以真诚的心对待。胡耀邦虽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有意见，但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始终希望通过弄清是非争取华的转变。对汪东兴也是一样希望他转变，但后来罗瑞卿告诉胡耀邦，“对汪东兴不能抱什么希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改变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在最后一次讨论邓小平的发言稿时（十二月九日），邓小平提出，讲话最后要加个尾巴：“让我们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说明邓小平当时还没有改变华国锋领导地位的打算。

邓小平和叶剑英的讲话，都安排在十二月十三日。叶剑英讲话时没有用原来的稿子，临时叫他女儿叶向真写了一篇短稿，在会上讲时，还未来得及把稿子印出。我问冯文彬是怎么回事？冯文彬说：“原来的稿子，小平、叶帅都同意了；乔木也看过，当时并未提出不同

意见。讲话那天上午，叶帅突然把我叫去，在场的有胡乔木、邓力群。叶帅说，原来那个稿子不用了，临时让孩子帮助写了一个稿子，下午要讲，来不及印了，讲完后请乔木修改定稿吧。”

胡乔木究竟怎么让叶剑英临时改变主意？冯文彬也不清楚。他只知道叶剑英原来那个稿子，邓小平看过之后已经定稿。后来汪东兴又给叶剑英送去他那个理论组起草的稿子。叶剑英似乎感到有点为难，让胡乔木出主意，于是产生了十二月十三日上午的变故。叶剑英那天讲话中最震撼的两句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在会后印出的“定稿”中，也被胡乔木“修改”掉了。

我想产生这一变故的真正原因，是讲话稿涉及党的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和人物的是非功过，有人害怕触及，才设法使讲话人临时放弃。其中有康生问题，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问题，中宣部和陆定一、陶铸问题，以及文革中和历史上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

康生问题在讲话中占有突出的位置。首先，“文革”及其以前流行的“左”的理论观点，许多出自康生及其设在钓鱼台的“反修”班子（李鑫、王力、邓力群、吴冷西、熊复、胡绳等都是这个班子的成员）。康生在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形成中，起着特殊作用。其次，康生又是从延安到文革这几十年历史上大量冤假错案的主要制造者。无论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是非问题，都无法回避康生这个障碍。这个禁区必须打开。讲话稿指出：

康生是一个在党内外有影响的人物，究竟有功，还是有过，还是有罪，是应当弄清楚的。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案、假案、错案的主要制造者之一，把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叛徒、特务，是康生开的头。他利用自己控制下的专案组，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假案，为大兴冤狱开创了最恶劣的先例。他还随心所欲地、毫无根据地把中央和地方的几百名老干部戴上叛徒、特务、内奸、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等帽子，使一大批好同志受害，有的闹得家破人亡。许多摧残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也是他最先提出的，如批判唯生产力论，按政治态度划阶级，资产阶级法权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都是他的创造发明。这笔帐不算一算，不向全党全国人民讲清楚，怎么能平党愤、平民愤？康生临终前才做出一些揭发四人帮的姿态，是他几十年看风使舵、玩弄两面手法的最后一次表演。有的工厂宣读《四人帮罪行材料》，读到康生托人传话揭发张春桥、江青的叛徒问题时，工人立即发问：“你康生早干什么了？江青能把张春桥的材料给你康生看，你们之间是啥关系？”可见我们的工人觉悟很高。人民要求把康生问题查清。这种要求合情合理，应该这么办。

关于中宣部和陆定一、陶铸问题，讲话稿是这样写的：

中宣部的问题没有解决，涉及到陆定一和陶铸同志的功过。陆定一担任过二十多年中央宣传部长，对党的宣传工作是有贡献的。陆定一专案组搞的那个结论站不住脚，我看要重新审查。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凡是错误的结论，都要纠正。毛泽东曾因康生谎报中宣部扣压四篇稿子批评中宣部，把扣压稿子比作阎王压制小鬼，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四篇稿子中，批判“赛金花”的一篇，中宣部同意发表，是康生自己扣压的；一篇根本没有送给中宣部；还有两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因为提到庐山会议罢彭德怀的官，中宣部主管此事者没有把握，送到中央书记处请示。这些事情当时并没有经过陆定一。至于批评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搞实用主义，批评得完全正确。康生和江青据此煽动全国砸烂阎王殿，是毫无道理的。陶铸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只有七个月，他因为遵照毛泽东批示，和张际春一起主持调查江青的一名打手吴传启的历史，就被打倒。接着，又被诬为叛徒，迫害致死，应予昭雪。

关于全国范围的冤假错案，讲话稿是这样写的：

我们面前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必须解决。林彪、“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这些年，把大批干部，大批知识分子，大批工农基本群众当作敌人来打，制造的冤、假、错案，包括株连的亲友家属，牵涉到一亿人之多。这样大的范围，这么长的时间，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全党

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发生这种不正常状况，必须尽快彻底纠正。假案、错案、冤案，不但文化大革命中间有，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延安整风时，也有人制造冤假错案，搞什么“抢救失足者”，十几岁的娃娃也被打成特务，这个人就是康生。林彪、“四人帮”、康生搞了许多假材料，陷害了许多好人，今天我们不来纠正，不但人心不服，也是党纪不能容许的。有人以为可以向人民隐瞒这些冤假错案，我认为不能隐瞒。只有向人民讲真话，才能取信于人民。我主张这件事要有专人抓下去，抓到底，不能放松。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反右派、四清等运动搞错了的，都要纠正过来。

这篇讲话稿除了涉及历史上重大是非功过问题之外，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组织和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建议，包括：加强民主与法治，恢复中央书记处，以及在三中全会后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集中解决思想路线和重大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等。这些都是叶剑英本来着重思考的问题。

分道扬镳

官方史书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作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把邓小平讲话称作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都不符合历史真实。

作为历史事件的比较，一九七六年的“十月革命”，华国锋、叶剑英抓了“四人帮”，虽说带宫廷政变色彩，但的确有四五运动的广泛群众基础，标志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时代的终结。三中全会只是走进历史新时期的里程碑之一。

至于邓小平的讲话，只是临时起意的急就章。工作会议于十一月十日开始，胡乔木的稿子于十一月十九日完成，交给邓小平。会议开到十一月三十日，邓小平看了叶剑英的稿子，才发觉在自己手中握了十一天的胡乔木稿子“思路不行”，要胡耀邦找人另写。后来在会上讲的稿子，只是适应会议进程的一篇急就章，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话，也只是照搬周扬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评价。所以说不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三中全会之所以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就，应归功于会内外的自由民主派，如叶剑英的急就章所言，“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成就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在思想领域，胡耀邦、周扬为代表的实践派，战胜了汪东兴、李鑫为代表的“凡是”派。

第二、在组织领域，解除了“凡是”派在一些要害部门的权力，如：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汪东兴、李鑫。

中央专案办公室正副主任：汪东兴、李鑫。

毛泽东著作委员会办公室正副主任：汪东兴、李鑫。

中央办公厅理论组组长：李鑫。

实际上只是解除了汪东兴、李鑫两个人的权力，他们手下的“凡是”派，不过是换了主人。

第三、华国锋的转变。华国锋在三中全会上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决定撤掉汪东兴的一切重要职务，态度是真诚的，在三中全会后很快得到验证。

三中全会一结束，胡耀邦就着手准备理论工作务虚会了。他找到他家里，要我起草两篇文章。一篇纪念毛泽东诞生八十五周年。他说，我们不搞“凡是”，但毛的正确的东西还是要肯定，像《实践论》，题目就叫《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用这个思想总结从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这个时期的原则争论。另外一篇就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实践论”那一篇他看了比较满意，对我说，他曾考虑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后来想还是让《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为好。

一九七九年元旦，我在家里起草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胡耀邦来电话，要我写完不必送印厂打印就给他送去（因印厂元旦休息）。过了两天，他又把我叫去，说引言可以用了，他只改动了一点过于尖锐的语言。他要我就在他的书房里起草一个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通知》，说明会议的设想，以他的名义与《引言》同时送给中央领导人及有关方面征求意见。

《引言》与《通知》发出后，华国锋第一个表示赞同。他对胡耀邦说，《引言》他看过了，很好。胡耀邦同他商量，请他与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华立即同意，要胡耀邦替他准备讲话稿。

就在这元旦前后，林润青给我来了几次电话，告诉我“胡乔木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我向胡耀邦反映。原来这位“思路不行”的胡乔木，在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迅速攫取了汪东兴、李鑫交出的权力，成为三中全会后获利最丰的暴发户，得意了起来。

胡乔木的第一把火，是攻击林润青组织的一篇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文章写道：“天安门事件告诉我们，关键问题是人民要真正当家作主。如果人民能真正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领导人，真正能够对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他们不称职时把他们罢免，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如果人民能够真正行使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能对天安门广场群众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文章指出：“我们国家还存在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侵犯。因此，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就成为一项长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胡乔木看到文章后，打电话给胡绩伟，严厉指责作者“只歌颂人民不歌颂党和领袖”、“是企图以民主党改造共产党”。

胡乔木的第二把火，是他以毛泽东著作委员会办公室新任主任的身份，到毛家湾找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要把国务院研究室归并给他们，由他们把理论工作领导起来。林润青要我反映给胡耀邦，他们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坚持拒绝让“凡是”派吞并，坚决反对“凡是”派领导理论工作。

胡乔木的第三把火，是提出三中全会后全国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股风，中国面临“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企图挑唆中央再来一次反右斗争。

我把林润青反映胡乔木的“三把火”告诉胡耀邦时，他说他已知道。胡耀邦告诉我，胡乔木先是到华国锋那里游说“反右”，碰了钉子。华国锋说：“把党和国家民主生活健全起来是三中全会决定的方针，无论如何不能反右派。”中宣部例会上，胡乔木又来游说，称“党内党外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股风，比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时还严重。”胡耀邦说：“我已找乔木谈了，他对形势的看法不妥，乔木做了自我批评。”

理论工作务虚会拖得很长，大致分三段：

第一段，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开得生动活泼，除了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思想路线和民主两大主题，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杜绝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很关注，看会议简报，对会议进展表示满意。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七日，邓小平两次听取汇报，发表意见。

一月二十日，邓小平说，讨论不限于真理标准问题，可以谈得更广泛些，好多理论问题，民主问题，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都可以谈；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现在理论工作落后实际，许多问题没有讲清楚。

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集中谈民主问题。他说：

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能否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可以从世界发展史，人类社会的趋势，从历史上讲清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资产阶

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他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

过去无产阶级没有搞好民主。无产阶级搞民主要超过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民主问题上斯大林犯错误，我们也犯错误。要讲讲巴黎公社原则，一条选举，一条工资制度。就讲这两条不够，最主要的是官吏从社会主人变成社会公仆，那两条是派生的。如何使官吏从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可能不只两条，要三条或更多。

西单民主墙，可有劲，但也带来麻烦，北美（美国、加拿大）成立支持中国人权同盟委员会。小青年不了解，以为资产阶级十全十美。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主人？资产阶级有一套使自己成为主人的东西，选举、立法，可以支配政府、官吏。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毛主席讲两参一改三结合，办法并不完善；还讲民主是手段，目的是什么？应是达到使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伟大目的的手段。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这篇文章。

那一天（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当场指定由胡乔木组织这篇文章。事后胡乔木并无动作。后来在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里，却有这么一段话：

大约春节前有一天，胡乔木对我（邓力群）说，这个会（理论工作务虚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也否定，那也否定，五个否定：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当时邓小平工作较闲，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邓小平和胡乔木谈话时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我相信胡乔木讲的这个话。这五个否定一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和胡乔木的想法是一致的。

邓力群是在伪造历史。一月二十七日正是春节休假的前一天。据我所知，“当时”邓小平不是“工作较闲”，而是格外忙碌。第二天他要动身去美国访问，连续几天都在忙“这件大事”，同外交部和华国锋研究访美方针和会谈方案，审阅为他访美准备的讲话稿，连陪同邓小平一起出访的吴明瑜都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时间去同胡乔木闲谈“五个否定”。他是因为关注理论工作务虚会，忽然产生要“写一篇民主问题大文章”来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这个“想法”，特意来讲这篇话的。假如邓小平真同胡乔木“想法一致”，对这个会的简报都“看不下去”，认为是在“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理由”，他为什么还要让胡乔木组织这篇“讲民主的大文章”，而不是“批五个否定的大文章”呢？合乎逻辑的指认倒是，胡乔木在那一天邓小平的讲话中，发现了同他自己的“想法”“不一致”，他也不想组织这篇大文章，只得去找邓力群设计如何改变邓小平的“想法”。胡乔木和邓力群在邓小平出国期间和回国之后，正是这么做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第二段：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至二月十五日，是民主派与反民主派较量阶段。

春节休假后第二段会议一开始，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民主问题的讲话，会议更加热烈起来。在胡耀邦领导下，会议成立了专题研究小组，分工研究重大理论问题。胡耀邦认为邓小平这一次讲民主观点比较透彻，应好好研究。他还提名七个人成立讲话起草小组（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吴江、阮铭、李洪林），准备为华国锋、邓小平起草讲话稿。胡乔木是起草小组成员之一，胡耀邦让他做召集人，结果他再也没有召集，而是去找邓力群一起向理论工作务虚会宣战了。

二月十三日，邓力群给理论工作务虚会写了一封信，说他看到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中，有人批评康生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撰写的一篇文章《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做党的同路人》。信中说，这篇文章是他和许立群两个人写的，由他邓力群定稿，以康生名义发表的；“康生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改一个字”。其口气是：你们批“四人帮”，批毛，批康生，竟敢批到我邓力群头上来了！

但这封信，正好表明邓力群、胡乔木们同康生思想完全一致，毋需“加一个字”、“改一

个字”。谁都知道，康生、邓力群这个“同路人”理论，是从庐山会议整彭德怀、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整习仲勋，直到文革中整一切“民主派”和“走资派”的“核心理论”。那意思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自由民主派，只是那个时期“党的同路人”。走过了这段路，国民党打跑了，现在共产党要一党专政了，你还想要自由民主，就不再“同路”，只能同你“分道扬镳”了。

胡耀邦似乎有点警觉，让会议简报于二月十四日登出邓力群的信，同时宣布二月十五日休会。

胡乔木、邓力群察觉到，邓小平二月八日回国后，注意力已转向越南，不再提民主大文章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了。二月十七日开始打越南，三月十六日撤回，打得不如预期顺利，党内对这一仗也有“杂音”。邓小平去美国前，对民主问题关注的热情已经冷却。胡乔木、邓力群看准正是向理论工作务虚会进攻的好时机，于是把他们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自由化”材料，同西单民主墙的“反动言论”，全国各地的“闹事”，统统摆到邓小平的案前，然后抛出他们所谓“五个否定”和所谓“理论队伍的分道扬镳”，建议邓小平“反右”。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第三段：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三日。

会议一开始，就是讨论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胡乔木“五个否定”（最后两个否定马列和否定毛合为一项，变成四项），邓小平和胡乔木的“想法”终于“一致”了。讨论稿比邓小平三月三十日讲的更凶。会上多数人都不同意刚刚开完三中全会就反右。经过胡耀邦的努力，邓小平讲话时，把反右和最凶狠的一些话去掉了。

胡乔木、邓力群深谙共产党掌握政权靠两手，“枪杆子”（军事暴力）和“笔杆子”（意识形态）。和平时期“笔杆子”更要紧，可以压倒“枪杆子”（如文革中“四人帮”压倒林彪）。胡乔木、邓力群自知弄“枪杆子”非其所长，靠王震那把“大刀”支援，自己弄“笔杆子”。

毛泽东对两杆子都亲自抓，抓得紧，既当“国王”，又当“教皇”。胡乔木虽在毛泽东身边做过“第一支笔”，自主发挥的空间不大。毛泽东常把胡乔木改动他的文章再改回去。

邓小平与毛不同，枪杆子握得紧，笔杆子握得松，对意识形态大而化之。胡乔木借此空隙，尊邓小平做“国王”，自己当“教皇”。他反对胡耀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拥护邓小平“掌握和运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然而毛已不在人间，谁来判断完整不完整、准确不准确？

胡乔木答得妙：毛泽东讲得对的，是毛泽东思想；错的，不是毛泽东思想。谁来判断哪个对，哪个错呢？“新教皇”胡乔木。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乔木反败为胜、进军“新教皇”的第一场大战役。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践派打败了旧教条主义的“凡是”派，理论工作务虚会新教条主义（“四项原则”派胡乔木、邓力群）与旧教条主义（“凡是”派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均投奔胡乔木、邓力群）联盟，向实践派、民主派反攻倒算，“分道扬镳”。